

中国农户投资行为分析

中国农村出版社

99
832.48
5

社

中国

农户投资 行为分析

吴绍田 著
■ 中国

社

前 言

我要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近几年对农户投资行为研究的一个小结。

在中国，写一本关于研究农户投资行为的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作者知识浅陋，经验不足，而且还因为在我国以前的经济理论中，对农户所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使得我们并无多少东西可以借鉴。同时，由于在20多年的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户作为非经济主体，在统计资料中很难找到有关数据。研究如同“无米之炊”。当然，我作为一个县级党校的管理者，还要承担一些干部培训的辅导课，因此，时间上的矛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但尽管如此，有利条件也还是有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已有人开始对农户的研究重视起来，并陆续有一些文章发表。虽然那是不系统的，但对启迪我的思考却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另外，我曾在乡镇主要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过8年之久，虽不敢夸口对农民完全了解，但对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我却始终不敢忘怀。这不仅是我萌发撰写本书冲动的原因所在，而且也是激励我一直勤耕不辍决心完成本书的力量源泉。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因此，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话不无道理。这不仅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有12亿人口的大国里，9亿是农民，而更重要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是中国的历史都是在农民的大笔下不断改写的。谁抓住了农民，谁就能赢得天下，这是历史向我们昭示的一个真理。

但可惜的是，这一真理却经常不被人们所重视。毛泽东同志

深谙中国历史，懂得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地位，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曾以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的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中国革命胜利后，他不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著名论述，而且在实践上对农民也似乎仍情有独钟。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他就倾注了极大精力以解决农民千百年以来一直盼望的土地问题。之后又紧接着亲自提倡农民发展农业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农业合作社，这使农民受到极大鼓舞，得到农民的一致欢迎。但由于1956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发生了错误，他亲自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的迅速推行，使他对农民的“偏爱”走上了极端，使他想让农民更快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的愿望，变成了对农民的严重伤害和农业20多年来的徘徊不前。

80年代初，由小岗村农民首先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场诱致性变革在全国的兴起，无疑是中国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为中国农业走向辉煌开辟了道路。但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上似乎又出现了一种理论倾向，即将家庭联产承包制等同于传统小农经营，认为家庭经营无法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因此，必须实行农村经济体制的彻底创新。进入90年代以后，又曾出现过两次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理论倾向，一次是以所谓的“五年徘徊”为背景，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中国农业“低而不稳”的病根；一次则以农业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化的提出为背景，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相悖，没有再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这曾在一些地区一度造成农村经济关系的混乱。

然而，之所以会不时的出现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倾向，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同志只看到存在于现实中的某些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与实质。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系统，9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初始阶段的家庭联产

承包制，尤其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在生产方式、生产工艺、产品经济结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在广大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正在悄然进行着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革命。它不仅具有非常现实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刻的文化与社会革命的意义。在这场悄然进行着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面前，理论工作者与决策者们究竟保持一种什么态度，是值得深思而后“动”的。

我以《中国农户投资行为分析》为题所作的研究，正是深思而“动”的一个具体表现。它将通过对农户投资水平、投资特征、投资结构的总体描述，以及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动力机制、演变趋势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进而对家庭经营责任制的制度绩效以及新的制度供给进行研究，同时，对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回答。

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现实性。从现实中提出问题，注重于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和解决，这是本书研究所有问题的立足点。一开始作者则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入手，对我国农户投资进行了现实描述，并以此为切入点，紧扣农村改革的现实，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绩效以及农户经营中的产权残缺、农户商品化兼业、政府“订购”价格、农民负担、粮食与收入增长的非均衡等外生性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它所给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2. 创新性。这是本书的着力点：①本书从实证角度对经济学界尚未涉猎、或虽已涉猎但尚未有人作过专门探讨的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例如，关于农民负担“5%”计提线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粮食与收入的非均衡增长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关于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经济分析；关于政府“订购价格”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探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见解。在方法论上,本书也有创新。例如,在分析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时,采用了独特的投入—产出,即成本—效益比较分析方法;在进行粮食与收入非均衡增长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时,作者在对劳动投入量、化肥施用量等要素与粮食产量、农民名义人均纯收入、实际人均纯收入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又对要素的边际贡献进行了考察,从而得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②在一些学术界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并已形成比较成熟的观点的问题上,作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例如,在对农户投资水平的考察中,作者在对农户名义投资水平、实际投资水平、农户人均总支出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一一考察后,得出的“农户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剧减的观点得不到统计数据的支持,就农户多方面条件而言,目前农户的投资还保持在一个基本合理的区间。但劳动积累的明显减少,却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巨大损失”的结论;在对农民负担“5%”计提线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考察中,通过对不同收入农户和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分析,提出的“农民负担分流制”的观点;从粮食与收入增长的非均衡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分析入手,导出了“集体出大头,国家定补,农户出工”的农业中长期投资的解决办法,和“将用 in 支持粮食价格的部分资金,重点用在农业的中长期投资上”的建议,等等,都是与众不同的创新见解。^③在对学术界有过比较充分的讨论并已基本形成定论的问题上,本书的创新则表现在技术上用经济分析方法(如用数学方法加以模型化)重新作了处理,使其分析线路更加明晰,结论更加明确。例如,对农户兼业生成机理的探讨,对政府“订购价格”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等等,都使用了数学方法,并尽可能运用统计资料加以验证。^④作者对西方经济学有关原理的吸收与运用,避免了生搬硬套,使每一论证过程都具有了“中国特色”。例如,在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经济分析中,作者在对目前理论界几种分析理论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贝克尔为代表的效益

最大化理论作了肯定。然后，通过对传统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等两个变量的引进，对其分析模型进行了修正，使最后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了方法论上的保证。

3. 系统性。全面、系统地对我国农户投资行为进行研究，然后得出一个综合的可供选择的对策体系，这是本书的一个着眼点。围绕着我国“三农”问题研究展开的农户投资行为研究，是一个理论前沿问题，近几年来理论界虽有一些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说，它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本书从基本思路到研究方法；从宏观把握到微观布局；从理论构想到实践运作，虽不敢说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可以说，在上述方面，本书以此为着眼点，是做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意义工作的。

4. 可操作性。本书所进行的任何方面的理论研究，都要面向实践，针对社会，要有可操作性，这是作者试图在本书写作上寻求的一个突破点。因此，无论是从基本理论的构想，还是到实践运作模式的设计，作者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客观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应该说，本书在完成过程中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当然，中国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它的难点不仅在于各方面资料的难以搜集和整理，而且往往因为它与农村经济体制等各种复杂因素糅合到一起，增加了问题把握的难度。至于书中的许多观点，到底有多少能被实践证明对了，并能被大家所接受，我没有作更多的考虑。我总觉得，这本《中国农户投资行为分析》中的观点，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论最终有多少能够成立，总是作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一点贡献。

最后，由于水平和精力所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1997年12月于山东莱西

内 容 提 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动力机制、表现特征、演变趋势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进而对家庭责任制的制度绩效以及新的制度供给产生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进行研究,为农村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1. 所谓农户投资行为,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投放资金于经济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是农户对未来生产的一种预期。从其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方式看,它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应包括投入的特殊形式——劳动积累。

本文以经济分析的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唯物辩证分析方法运用于整个经济分析之中。

2. 对农户投资水平的考察是围绕农户的农业投资、非农业投资、劳动积累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展开的。对农户农业投资的考察,作者不仅考察了农户的名义投资,还对其实际投资和家庭经营支出与当年生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等进行了考察;对非农业投资的考察,作者改变了以往单纯将人均非农业投资的年投资额与年增加额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把问题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货币性支出上;这里劳动积累也被作为农户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纳入了考察的视野。对凝结在农业工程项目中的劳动积累和直接表现在增收农产品中的劳动积累进行了分别考察。而对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考察,则是对农户教育投资、迁移费用、医疗保健费用和生活费用的加总。

通过考察分析,作者认为,农户对农业资金投入剧减的观点

得不到统计数据上的支持。就农户各方面条件而言,目前农户的投资还保持在一个基本合理的区间。而非农业投资额虽逐年有所增加,但占农户生产投资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农户的生产性现金支出,正在由二三产业转向畜牧业。劳动积累剧减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它是一种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在大部分年份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幅度,而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投资增长比,其速度明显见低。

3. 通过对农户投资中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占份额,长效有机肥使用量,劳动积累投入量,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以及农户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社会管理成本的影响等方面的考察,作者发现,农户投资行为明显表现出短期性的特征。农户投资兼业化,是作者在对若干材料进行认真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并认为,农户兼业是土地资源稀缺与农户最大化行为的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农户投资的货币化特征,是作者对农户投资物质形态进行考察后的又一个发现。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化程度大大高于流动费用支出的货币化程度,非农业投资的货币化程度为更高。农户投资的地域差异性,是农户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自然资源的丰度和社会文化与经济条件的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是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

4. 作者通过分析与研究总结出三点认识:①在农户总投资中,农业投资比重仍占大头,并呈缓慢上升趋势;而非农业投资占有一定位置,但呈微弱下降。农户投资的这种结构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不同的区域位置,表现是不尽相同的。②在农户农业投资中,种植业投资为主要形式,且畜牧业比重还有继续攀高趋势。农户投资的这一结构特征,同样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区域位置影响。③在非农业投资中,家庭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仍是农户的主要投向。这里,其阶段性特征较其农业投资更为明显,它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④在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中,生

活费用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教育费用、迁移费用和医疗保健投资却呈上升趋势，且增幅较大。这说明，我国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正在实现由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的转变。

5. 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三次制度变迁所作出的不同制度安排而形成的不同产权结构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分析入手，导出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有一个较高的制度绩效。即：极低的交易费用，较高的激励效应。第一次土地制度变迁——土地改革，之所以表现出较高的制度绩效，主要是因为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第一次实现了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农民创造的果实第一次和全部归自己所有，从而免除或减少了监督成本和交易费用，激励成为极其有效的“动力源”。而1956年以前的合作社形式，以农户意愿为前提，以按“资”按“劳”付酬相结合为主要分配形式，它表现为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由于某一成员的违约可能导致的合作社解体的威胁，大大降低了成员间偷懒的发生，并促进了所有成员的劳动努力。与此相反，集体化之所以对农户投资行为表现出极低的激励绩效，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推行，作为农户退社的自由被剥夺，使合作社的性质由一个重复博弈变为一次性博弈，并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工分成为衡量每个成员的劳动消耗和劳动报酬的尺度。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反映农业劳动者的实际努力和真正贡献，对劳动的激励也就会失效。在家庭经营下，劳动者清楚地知道他生产的劳动成果，扣除一切必要支出和上缴外，全部归自己所有。所以其激励是高效的，它促进了农户努力供给程度的增加，调动了农户投资的积极性。家庭经营是最有刺激、最有效率的制度。

6. 在制度分析之后，作者提出了“制度外生性因素”的命题，并认为，这些因素并不具有家庭承包制这种制度创新的内部规定性，而只是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存在于现实实践中。但它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制度的均衡与变迁完全不能离开外部因素而存在。目前家庭承包制所表现的某些制度缺陷，正是这些外部因素对制度

创新的侵蚀，通过家庭承包制加以表现的结果。作者认为：

(1) 产权残缺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障碍，通过承包公有农地产权之使用权，而使家庭成为产权主体的形式是我国目前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形式。然而，实践中农户所获得的这种产权是残缺的：①从占用权来看，谁获得了财产的使用权，谁就占用了财产。占用权应该成为使用权主体的专利。但实际并非如此。有的所有者主体，经常以“服务”为名，对农户要种什么，不能种什么横加干预，甚至出现“毁青”现象。有的为弥补日益增多的亏空，经常以“完善”为名，对土地承包进行随意调整。这种以否定排他性为特点的行动，使占用权成为“虚置”，使农户对产权运作结果预期变为不定。其投资行为也就必然表现为短期化特征。②从受益权来看，它是财产投入经济活动后，所有者主体和使用者主体对财产运作结果进行分割的权利，是所有者主体与使用者主体在交易时的一种预期。而实践中，不少地方却将每年的“负担”随着使用权而平均分配，使收益权变成了“负担权”。有的地方即使没有随土地使用权而平均分配，也经常以各种名义滥摊滥派。这不仅削弱了农户的投资能力，而且使农户向土地投资变为不经济，导致资金和劳动转向非农产业。③从处置权来看，它表现在农地承包中，主要是土地的转让权问题。在一开始，这种权利是被禁止的。现在尽管提倡，但社区内“不准转让”，“不得继承”的“规矩”，仍然被人们固守着。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户投资的兼业化程度，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要使这一状况得到解决，必须还完善的产权以农户，使农户成为真正的产权主体。

(2) 农户作为经济人，对利润最大化或某种效用极大满足的追求，是农户商品化兼业生成的主要原因。而人多地少，社会就业机会有限，产权主体理性化，是促成农户兼业投资的充分必要条件。三个条件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农户都可以放弃兼业。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并共同作用于农户身上，农户才会生发出兼业的行为。

农户兼业、农户兼业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它符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有利于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兼农户及一兼化的发展更是如此。对一兼户我们要积极培养，使其成为我国现阶段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基本主体；对二兼户要积极加以引导，促其尽快实现向纯非农户的彻底转变，从而促进我国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的实现。

(3) 政府“订购”价格低于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政府的这种购买行为，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其直接影响将引起农户农业收入的减少，从而或引起农户农业投资能力的下降，或引起农户资金和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直接导致农户农业投资的减少。其间接影响表现在：由于政府对农副产品的低价收购，集市贸易价格必定高于市场的均衡价格。这一方面客观上加剧了农户的兼业化趋势，使得一些本来有一技之长并具备进行非农产业专业化生产条件的农户，不得不继续实行兼业。另一方面，它客观上加剧了农户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部门的投资风险，使农户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

(4) 以村为单位执行的“5%”负担计提线，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不同类型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农民负担额与农民现金收入扣除现金性生活费用支出的比值的稳定性看，“5%”计提线对正处于人均纯收入线上的农户的投资并不构成明显影响；而以1994年基尼系数为0.32计，对49.42%的超过了“5%”计提线的人口来说，其投资要随着超出比例的大小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那么，很显然，对20%和10%的负担率超过了42.24%和108.7%的农户来说，再谈什么投资，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由于农民负担的计提依据是非农产业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方面，这就意味着对非农产业收入来说，在受到了非农产业税种管制后，还要再按非农产业计征一定比例的“负担”。同时，还作为构成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重要部分，要第三次被“课税”。作为一种长期政策，它一方面客观上形成了对农民身份的歧视，一方面

势必对农户投资构成影响，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由于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农民户口作为承担农民负担的直接原因，无论农民是否承包了土地，或从事于哪一种产业，只要户口在农村就有承担“负担”的义务，这使得一部分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投资，完成向非农户的转移，造成兼业投资户的更多出现，阻碍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影响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5) 粮食与收入增长的非均衡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经济现象。目前，这一经济现象下的农户投资行为仍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正是来自于农户对信息资源的高度重视和迅速而准确的反映。现在的问题是，评价农户投资行为是否合理，关键要与“增、减、多、少”作严格区分。增了、多了，在现实中不一定是合理的；而减了、少了也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客观评价标准。我们之所以说目前粮食与收入增长非均衡下农户投资行为是基本合理的，主要是将判断建立在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之上。自农村改革以来，与粮食生产表现出强相关的化肥施用，是一个不断增加的量，而化肥的粮食边际产出递减的状况，又使其增幅不可能太大。农机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倾向的出现，既是生产要素置换作用的结果，又是粮食与收入的非均衡增长状况所致。这是农户在非均衡状况下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性行动，也是我国二三产业发展，经济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

7. 本章从文化角度，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首先，作者通过对传统文化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得出四点认识：①对小生产的特殊感情，使农户对目前的家庭经营形式特别适应，并表现出强烈的求稳求长心态，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隐患。②信奉“士农工商，以农为本”，这可能是中国农户近几年来不管形势如何对他不利，农业投资都没有表现出大起大落的一个可能的解释。但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③强烈的求实求验

心理和坚韧的吃苦精神，使他们往往特别重视劳动投入，忽视了科技投入；而容易满足又会使他们忽视了对再生产的投入。^④对婚姻“无后”那种痛心彻骨的悲哀，使他们对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有一种偏好；而读书的朴素实惠感，又使得大部分农户对下一代智力投资比较重视。其次，作者在对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作一总体判断的基础上，对其与农户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与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也逐年提高。而从农户投资的具体内容看，它与我国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关系，与农户现金性投资呈弱相关关系，与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呈一般相关关系，与农户文化教育投资呈较强相关关系。而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其原因主要是受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影响，这包括投资的方向约束、产业约束、政策约束、文化约束，以及集体经济的发达程度等。从农户的择业行为看，它直接受劳动者文化程度的影响。农户经济的产业类型的层次如何，发展水平如何，首先受制于劳动力文化素质的高低。而各农户行业类型在整个产业结构的层次水平及其对劳动力文化水平的不同要求又决定了劳动力在各产业层次的分配心态。

8. 本章首先通过对目前关于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几种主要理论取向的介绍和评析，导出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即：“效益最大化”的分析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而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影响，以及生育有计划的基本国情，将社会文化因素和制度与政策解释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整合在经济分析中，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都非常有意义。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第二节中，即分别建立起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入产出模型。以 F_1 表示生活费用、 F_2 表示医疗保健费用、 F_3 表示教育费用、 F_4 表示迁移费用、 F_5 表示“影子成本”、 F_6 表示用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费用， n 为人口再生产投资完成所需时间、 m_1 为入学年龄、 i 为市场资金平均利率，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入模型则为：

$$F = F_0 \times (1+i)^n + \sum_{t=1}^n (F_1 + F_2 + F_4) \times (1+i)^t \\ + \sum_{t=n_1}^n F_3 \times (1+i)^t + \sum_{t=1}^{n_2} F_5 \times (1+i)^t$$

以 t_1 为孩子进入劳动领域的时间, t_2 为脱离农户家庭独立生活的时间, t_3 为开始赡养父母的时间, t_4 为完成对父母的赡养时间, 产出模型则为:

$$\Sigma R = \sum_{t=t_1}^{t_2} I_1/(1+i)^t + \sum_{t=t_2}^{t_3} I_2/(1+i)^t \\ + \sum_{t=t_3}^{t_4} I_3/(1+i)^t + \sum_{t=0}^{t_1} I_4 \times (1+i)^t$$

在建立起投入产出模型后, 第三节以效益最大化 (MR = MC) 为分析工具, 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展开了理论分析。作者认为, 在传统农业阶段, 由于生育子女多的农户要比生育少的农户更具有经济优势。因此, 农户多生孩子、生男孩子的欲望特别强烈; 而当进入农业较发达阶段, 生育孩子的成本加大, 用在孩子数量方面投资的机会成本提高, 农户就会自动作出少生孩子的安排。当然, 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过程, 还要受到传统文化、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经济模型的修正, 主要是通过调节边际效用来实现的。传统文化对后代延续性的重视, 直接增加了农户家庭生育男性的声望、心理满足等方面的收益。因此在生育成本不变的前提下, 均衡点会发生上移, 从而导致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向数量扩张型投资形式倾斜。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目前的一项基本国策, 它以奖励优生, 处罚超生、抢生为主要表现特征, 直接调节了农户家庭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 从而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施以影响。如果说传统文化下, 农户对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增加, 意味着效用的提高, 那么, 计划生育的实行, 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户的生育成本加大。而当 $MC > MR$

时,农户就会自行对人口再生产的投资作出调整,减少人口再生产数量方面的投资,以求新的均衡。

数量与质量是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决策中需要面对的两个方面。而当一种投资的边际效用高于另一种投资的边际效用时,农户则将增加这一种投资而减少另一种投资,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选择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文化对中国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少,而市场经济意识将不断增强。从注重对子女数量的投资转变为对子女质量的投资以及提高自身素质的投资,将成为今后农村人口再生产的新形式、新内容、新特点。

9. 作为全书的逻辑归属,作者作如下推论:①现阶段农户投资行为是基本合理的。家庭责任制仍然有着较高的制度绩效,而任何借“农户投资”来夸大制度变革需求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其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②要不断实现农户投资与政府目标的有机统一,必须变革制度外生性因素。优化政府行为,完善有关政策,改革宏观环境。③农户兼业、农户兼业化目前在我国的存 在有其必然性,也是我国很长一个时期内的一种现实选择。它将伴随着传统农民彻底丢掉冠以他们身上的标识而走向终结。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扩展是目前我国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一条主线,要使这一主线得以继续延伸,必须实行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上的进一步转变,加大工作措施提高工作质量。⑤在现行体制下,企图主要依靠农户投资来改变中国农业投资不足的现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要使农业投资得到保证,必须对国家、集体、农户的投资职责进行科学界定,并以法律形式严格规定,抓好落实。

ABSTRACT

A SURVEY ON FARMER HOUSEHOLD BEHAVIOR OF INVESTMENT

This book analyses the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 and the evolution tendency of farmer households' investment behavior, stud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surveys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possibility of the new system given, attempts to supply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ural reform.

Farmer households' investment behavior, is an intergrated pattern of family behavior that funds are put into economic process, for making a profit or pursuing a certain kind of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four major investment: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Non-Agricultural Investment, Labor Accumulation and Family Member Reproduction Investment.

1. An overall description of investment level, characteristic and structure. Based on examining farmer's investment level, the author starts his arguments. He doesn't think the statistical data supports the view that the farmer households reduce capital input in agriculture. As far as their condition concerned, the investment is being kept in a rational region. Although the Non-agriculture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 yearly, its proportion in total investment tends to descend. The farmers cast cashes on the livestock husbandry, not o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or the service sector like

before. Without doubt, labor accumulation has been dropped rapidly. In comparison, member reproduction investment keeps higher growth scope in recent years, but which is inferior to the growing speed of farmers' per capita income.

Besides,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the applicable amount of organic fertilizer with enduring effect, the input of labor accumulation, the investment status of manpower capital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management cos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whole investment is short-run, regional, diversified and monetary.

The above analysis apparently suggests that: a. In total investment,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 investment exceeds half and trends to go up, which of non-agriculture investment comes down slightly. b. In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farming is main pattern and the farmer households would prefer to invest in animal husbandry. c. In non-agricultural investment, family handicraft, transportation, catering trade and business service constitute main investment direction. Obviously, it's directed by the state's macroeconomic policy. d. In family member reproduction investment, the living expense is cut down gradually, but the outcomes in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care keep rising and the growing scope is large.

2.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ome influential factors. By studying the impact on farmers'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ree system change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recognition be drawn: being a good system arrangement, it should have the superior effectiveness. That is to say, lower transaction cost with higher stimulus effect. The 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improved the exertion of the farmer households,